

不可不读的传世名篇 不可不知的经济思想  
品扣人心弦的小故事 与伟大的思想家同行

# 与大师同行

## 经济思想史公开课

赵峰◎著

*Walking with Master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与大师同行

## 经济思想史公开课

赵峰◎著

Walking with Master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大师同行：经济思想史公开课 / 赵峰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5  
ISBN 978-7-300-22745-0

I. ①与… II. ①赵… III. ①经济思想史-世界 IV. ①F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4088 号

## 与大师同行——经济思想史公开课

赵 峰 著

Yu Dashi Tongxing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5.5 插页 1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3 000	定 价	43.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目 录

“俗人”色诺芬 // 001

柏拉图：欲望、分工与城市 // 005

亚里士多德：“自然”的经济伦理观念 // 009

西塞罗和滕宗谅 // 013

谁是这部经典的著者？ // 016

蒙克列钦：一个天真的爱国者 // 021

托马斯·孟：一个开明的重商主义者 // 024

柯尔培尔：一个“大理石般的男人” // 027

约翰·罗：天才与赌徒 // 032

威廉·配第：“泛经济主义” // 038

约翰·洛克：为财产权辩护 // 043

达德利·诺思：第一个正确理解  
利息的人 // 048

曼德维尔：美德与恶德 // 054

布阿吉尔贝尔：法国农民的辩护人 // 059

理查德·坎蒂隆：“经济学家中的企业家” // 065

魁奈和他的重农学派 // 069

杜尔哥：思想家和行动者 // 077

大卫·休谟：他只有一个脚后跟留在重商主义 // 083

斯密的“爱情” // 088

亚当·斯密关于“文人的道德品行” // 091

亚当·斯密的“剽窃”指控 // 095

亚当·斯密与两任英国首相 // 098

查尔斯·汤申德与经济学 // 101

边沁与功利主义 // 104

李嘉图的“遗产” // 111

李嘉图与詹姆斯·穆勒和马尔萨斯 // 116

西斯蒙第的思想转变 // 122

马尔萨斯：“经济学是一门阴郁的科学” // 126

“巫者”迫害与马尔萨斯 // 133

“萨伊定律”还是“斯密定律”？ // 137

荒诞不经的凯里先生 // 141

约翰·穆勒：经济学家的情感史 // 146

狄更斯眼里的“经济学” // 152

巴师夏：“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 157

重新认识西尼尔 // 164

马克思和李斯特的“交集” // 171

杰文斯：一个诚实而伟大的人 // 173

忧郁的米塞斯 // 179

熊彼特的“神圣十年” // 185

- “李嘉图恶习”和熊彼特“厄运” // 190
- 熊彼特老师 // 194
- 凯恩斯·思想 // 202
- 琼·罗宾逊与马克思主义 // 205
- “资本主义精神”与富兰克林 // 213
- 欧文·费雪的传奇 // 217
- 周末，跟哈耶克在一起 // 221
- 感恩，弗里德曼 // 225
- 科斯来了，科斯走了 // 231
- 加里·贝克尔：“经济学帝国主义”及其他 // 236

## “俗人”色诺芬

《荀子》说：“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说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公元前355年）是个“俗人”，显然不是说他不学无术或者鸡鸣狗盗，而是说他是一个热衷于物质利益的世俗之人。在对待世俗经济方面，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最著名的两个学生色诺芬和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是两个极端。理想主义的柏拉图总是给人伟岸端庄、儒雅高洁的印象，而现实主义的色诺芬则显得利欲熏心、俗不可耐。

色诺芬作为一个“俗人”之“俗”，一是表现在其行为中，二是反映在其著作中。公元前401年，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与其叔为争夺王位开战，色诺芬加入了小居鲁士的雇佣兵，前往波斯参战。同样是参战，参加雇佣兵与参加卫国战争显然不同。苏格拉底曾经率领色诺芬和柏拉图参加过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参加卫国战争，是光荣而正义的。而色诺芬参加雇佣兵，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金钱利益的考虑，这不仅与正义无关，也与苏格拉底一贯教导的处世原则相悖。苏格拉底并不支持色诺芬参加雇佣军，但色诺芬还是我行我素。这次参战以失败告终。色诺芬率领落败的部队回到雅典的时候，苏格拉底已经被雅典国民议会以“不信神”和“蛊惑青年”的罪名判处了死刑。因为色诺芬助战的一方曾经是雅典的敌人，加上担心色诺芬可能因为他老师的冤死采取行动，雅典国民议会决定将其放逐。色诺芬逃到斯巴达，从此不再参战也不从政，一心经营自己的庄园。后来他将自己经营庄园的心得写成了《经济论》一书。《经济论》采取对话体的形式阐释色诺芬的经

济及管理思想，对话的主角是苏格拉底。在这部著作中，苏格拉底不再是柏拉图笔下那个道骨仙风的哲学家，而是一个现实得有些猥琐的庄园主和守财奴。总在喋喋不休地吹嘘积累财富和管理家产的技能 and 策略——尽管自己贫穷到了衣不蔽体的地步——从播种、田间管理、收割到储藏，从家具使用到孩子教育再到奴仆的指挥，苏格拉底俨然一位现代理财顾问。

色诺芬关于苏格拉底更加生动而丰富的言行描述集中体现在《回忆苏格拉底》中。在这本书里，色诺芬针对雅典国民议会对苏格拉底的审判进行了辩护，并全面阐述了苏格拉底的哲学思考。这部著作对苏格拉底言行的记述和个性的刻画，与柏拉图有着很大的不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他负有将雅典人从庸碌的世俗生活中拯救出来的使命；他像牛虻一样不断叮咬雅典这匹肥马，力图使其保持振作。他希望雅典人不要沉迷于世俗的享乐之中，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灵魂的拯救和精神的提振上来；他所向往的有价值的生活，是一种与现实保持距离，对物质欲望保持克制的生活。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中的苏格拉底，虽然还是一个哲学家，还在宣扬自制、德行、正义等等价值，但宣扬这些东西似乎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本身有价值，值得追求，而仅仅是因为这些东西有助于达成某种目的，而这种目的往往和经济利益的实现有关。在色诺芬笔下，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具有明显的入世特点，他的使命不是将人们从世俗生活中拯救出来，而是推动人们积极参与世俗生活。

比如，谈及人与人的关系，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说：“如果你通过为人服务，就会发现谁肯为你服务；通过你施惠于人，就会发现谁肯施惠于你。”<sup>①</sup>虽然商品经济尚不发达，但色诺芬实际上已经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商品交换关系。他甚至将利益关系扩展到一切人际关系包括伦理关系中。在他看来，人们是否服从传统的伦理，不是取决于伦理价值本身，而是取决于其经济效用。苏格拉底的儿子对母亲心怀怨恨，因为他的母亲不讲道理，脾气很坏。在柏拉图的笔下，苏格拉底强调孝顺父母是子女的本分，但在色

<sup>①</sup>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诺芬的笔下，强调的是不孝敬可能会损害子女的切身利益，比如按照雅典的有关法规，不孝敬父母的人不能担任城邦的领导，还要被调查并被重罚。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色诺芬用很多篇幅介绍了苏格拉底关于交朋友的理念。苏格拉底提出，作为朋友，应该具备正直、勇敢、坚毅、自制、智慧等素质，原因不在于这些东西是一个雅典的正直公民应该具备的素质，而是因为朋友应该比自己具有更高的道德素质，这样才有利于自己的提高。苏格拉底还强调对朋友表现友谊应该寻找合适的机会，那就是在朋友陷入困境的时候。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苏格拉底用了一个庸俗的比喻：“当有市价的东西最贱的时候就是买进的最好时刻。”<sup>①</sup>

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的世俗形象，在他与赛阿达泰的交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赛阿达泰是雅典一名绝色的妓女，苏格拉底一再听说她的美貌，决定前往一睹芳容。在与赛阿达泰的交流中，苏格拉底首先肯定赛阿达泰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产业谋取生活来源并过上富裕生活的正当性，在他的观念里，利用身体致富同依靠家族财产没有什么不同；接着，苏格拉底以一个“专家”的身份，与赛阿达泰探讨了利用身体资源获取财富的技巧问题。苏格拉底告诫赛阿达泰：“首先你只能要求那些求爱的人做他们极不费力就可以做到的事情，然后你还要继续慷慨地还报他们，这样他们就会向你由衷地表示真诚，长久地爱你，并尽量地善待你。但如果你等他们向你提出要求的时候才把你的爱情给予他们，他们对你的感激心情就会最大。因为你看，即使是最美味的食物，如果是在人还不想吃的时候就给他摆上，也会觉得没有滋味；如果是在他吃饱的时候给他摆上，甚至还会令他讨厌，但如果是在人们饥饿的时候给人们什么，那末，即使是比较粗粝的食物，也会觉得很可口。”<sup>②</sup>在向赛阿达泰传授调情谋财之术时，苏格拉底不仅表现得像某些现代“经济学家”对待权力和金钱时那样敏感和殷勤，其理由也有现代经济学的某种意味。“对于那些已经感到满足的人，就不要再把你的爱情给他们，也不要使他们想起这件事来，直到他们满足的心情已经消逝，再度感到有需要的时候，你就以

<sup>①</sup>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83页。

<sup>②</sup> 同上书，128页。

非常正经的谈吐和半推半就的姿态对付他们，使他们如饥如渴的心情达于顶点，因为在这样一个时刻，同样的赐予比在人们还没有感到那么迫切需要的时候给他要强得多了。”<sup>①</sup> 苏格拉底的谆谆告诫显示，他似乎领会到了两千多年之后的“戈森第一定律”：边际效用与满足程度成反比。在柏拉图的笔下，苏格拉底尽管不排斥女色，甚至也不排斥男色，但还不至于对于调情之术如此津津乐道、对谋财之道如此孜孜以求。苏格拉底对于君子的德行有着较高的要求，而且坚持身体力行；在他看来，一个不能控制自己欲望的人是一个懦弱的人，是一个对城邦有害无益的人，是一个人生历程中注定失败的人。所以，对性采取如此宽容态度的也许不是苏格拉底，而是色诺芬。

在经济思想史上，色诺芬第一个提出“经济”的概念，确定了以人们世俗的物质福利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的起点。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关于世俗生活的学问，“俗人”色诺芬热衷于这样的学问情有可原。也只有色诺芬这样的“俗人”而不是柏拉图那样的贤人才擅长研究这样的学问。

---

<sup>①</sup>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129页。

## 柏拉图：欲望、分工与城市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与弟子及朋友们讨论正义问题。问题起源于对城市败坏的原因分析。苏格拉底认为，雅典之所以败坏，是由于正义的丧失。苏格拉底区分了城市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他认为城市的正义就是每个人按照天分在城市中做好一件适合自己的工作。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之间有过一场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精彩争论，我们可以第一次看到苏格拉底在辩论中处于下风。色拉叙马霍斯认为所谓正义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强者的利益”，他的例证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显示出柏拉图对时局的深刻忧虑。

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所说的城市的正义，其实就是基于人的天分的社会分工，这也是他的“理想国”的构建原则。在他看来，上天在创造不同的人的时候混合了不同的金属，从而使人具有了不同的品性和天分，适合不同的职业。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天分在城市中寻找并尽力完成一项工作，城市的运转就会井然有序，城市的正义就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这个观念有点后来的新教改革中的“天职”的意味。

苏格拉底说，分工的产生，同时还是适应人的需要或者欲望的过程。人有不同的需要，就要求有不同的行业或者产品来满足。比如，人需要食物，就要求有人从事农业；人需要衣服，就需要裁缝；因为大家要有房子住，所以需要工匠。这样，如果人们只有三种需要，就要求有三种职业。进一步，每个人都需要多种物品，而在分工背景下，每个人至多只生产一种商品；解决矛盾的方式就是交换。再进一步，为了使交换变得更加方便易行，就需要

参与分工的各行各业集中居住，这样就出现了城市。这就是柏拉图或者苏格拉底从需要、分工及交换关系出发对城市产生的解释。这种解释中实际上有“交易费用”的观念，当然他还不可能有这一概念。

苏格拉底说到这里的时候，引来了柏拉图同父异母兄弟格劳孔的嘲笑——“苏格拉底，你所说的城市是一个猪的城市。”苏格拉底告诫格劳孔不要着急，接着娓娓道来人的欲望扩张与社会分工相互推动从而推动城市扩张及其性质变化的思想。在这里先解释一对概念：需要和欲望。在古希腊的观念里，需要和欲望是有区别的。需要具有自然的性质，而欲望具有超越自然的性质。衣服自然的功用是用来保暖的，穿得暖一些、体面一些都是需要。而过分讲究穿着，为了炫耀甚至其他变态的心理，那就是欲望。需要总是有限的，而欲望则是无限的。苏格拉底接着说，当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为了使生活变得舒服一些，使生活质量提高一点，会有一些新的行业被引进，比如医生、厨师。这时的分工还是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这时扩大并发展的城市是繁华的城市，还是健康的城市。

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欲望还在不断发展。适应人的欲望的发展，分工会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会有一些新的行业产生，比如诗人、舞者、乐师、妓女……城市的规模因为分工的深化和细化而扩张，分工也因为城市的扩张而不断深化和细化。进一步，在这种欲望扩张和分工深化的背景下，城市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城市日益失去和谐与平衡，日益变得盲目和狂躁，成为“发高烧的城市”。再进一步，由于人的欲望在无限扩张，当城市的资源不能满足人们的欲望时，对外战争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在柏拉图观念里，分工和城市的产生是适应人的需要或者欲望发展的结果。人的需要或者欲望的扩张，推动着分工的深化和城市发展，反过来，城市的扩张又进一步适应和推动着需要或欲望的发展。在之后的文化观念中，城市逐渐成为欲望和欲望满足及扩张的代名词。这一观念在《旧约·创世纪》中有着生动的描绘。

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世代生活在一个叫做乌尔的地方，他们是游牧民族，靠放牧牛羊为生。一天，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的呼唤，要他离开乌尔；

上帝许诺他成为一个大国的君主，那里牛奶和蜂蜜像泉水一样流淌，他的子孙将像沙滩上的沙子一样多。只有侄子罗得愿意跟随，其他人都以为亚伯拉罕疯了。

他们一路放牧着牛羊，向着上帝许诺的迦南而去。牛群和羊群在不断增加。到了埃及的大草原，两家的仆人经常为争夺草场和水源而争吵甚至打架。于是亚伯拉罕决定和罗得分开。他们对草原进行了产权分割。划定边界之后，罗得选择靠近所多玛城的那片草场。之后，罗得慢慢移居到了所多玛。

所多玛和蛾摩拉是两座邪恶之城，那里的人集中了人类可能有的所有邪恶。上帝决定要毁灭所多玛，要将邪恶从世界上铲除。自从大洪水以来，这是上帝第一次决定对人类进行惩罚。大洪水之后，上帝立约不再对人类实施全面惩罚，这一次他决定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只是对人类中最邪恶的那一群人进行惩罚。

途中上帝和他的使者来到了亚伯拉罕的门前。亚伯拉罕是那样一个大义之人，他奉献出珍贵的清水给他们洗脚，又宰杀羊羔给他们充饥。上帝喜爱并宠爱亚伯拉罕，他许诺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离开的时候，上帝把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的信息告诉了他。亚伯拉罕提出反对意见。他说所多玛城有很多恶人，但也有义人。如果毁城，意味着义人和恶人一样被毁。他想到的是他的侄子罗得。他央求上帝撤回决定。上帝说，如果所多玛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他将撤回决定；亚伯拉罕跟上帝讨价还价，如果只有四十个义人呢？上帝同意了。亚伯拉罕得寸进尺，如果只有三十个义人呢？上帝也同意了。如果只有二十个义人呢？上帝也同意了。如果只有十个义人呢？上帝同意了，但不能再少了。

上帝的使者进入所多玛城考察。所多玛果然是个邪恶到极点的城市。看到有外乡人进城，就有成群结队的流氓围着他们要行不义之事。罗得央求他们放手，说愿意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他们，但不要伤害外乡人。当晚，上帝的使者就住在罗得家里。所多玛城的义人仅有罗得一家，夫妇二人，女儿二人，女婿二人，果然不足十人。凌晨，上帝的使者将上帝的计划告知罗得一家，要他们离开所多玛，并告诫他们在上帝毁城之际，不能回头看。当罗得一家

离开所多玛之后，上帝就将硫磺和火投向城里，顿时火光冲天。罗得的妻子因为好奇，回头一看，立刻变成盐柱。

《圣经》的故事有着诸多深刻的含义，有的是世俗的观念无法理解和把握的。关于所多玛作为城市所内含的欲望及欲望的扩张，却可以在柏拉图“欲望—分工—城市”的框架内得到理解。柏拉图的分析还显得朴素、简单甚至粗糙，但却可以成为后世进一步探讨的一个源泉和起点。实际上，柏拉图从分工的角度理解城市或者城邦或者国家产生的思想，成为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思路。而且，同近代以来的霍布斯及洛克等人的社会契约论相比，柏拉图的解释内含更多的经济学的意味。

## 亚里士多德：“自然”的经济伦理观念

古希腊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是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不同思想家对此有不同的思考，也有不同的应对思路。总的来说，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从而供给严重不足的背景下，人们更多地将平衡供给和需求的希望寄托在抑制需求上。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工业革命之前。受制于生产力水平，古希腊的思想家对物质需求大多持有某种程度的克制态度，色诺芬主张节制需求以平衡收入和支出，柏拉图希望通过国家对消费的控制来抑制需求，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公元前 322 年）则主张推行“自然”的经济伦理来制约需求。相对而言，严谨而又深刻的亚里士多德的思考要更加深入和系统一些。

“自然”具有本源（source）或本性（nature）的含义。按照古希腊人的观念，上天创造万物，赋予其本来的性质和功用，按照事物的本性或本来功用使用物品就是自然的，否则就是对自然的违背。“自然观”提供了一种经济伦理、一种行为规范，符合这一伦理和规范的行为就是合理的、值得提倡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不值得提倡甚至应该反对的。这一观念的规范作用有点像现代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合乎理性的行为才是合理的，不合乎理性的行为就是一种不可理喻的疯狂。进一步，亚里士多德对财富、获取财富的手段及货币的性质进行了“自然”与“不自然”的界定。

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里，财富的自然功用就在于满足人的需要，只有那些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质条件才具有财富的性质，一旦超出这一范围，就不再构成财富。财富成为善的条件就是有限地获得和使用。需要强调的是，在古希腊思想家的观念里，“需要”与“欲望”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要求。“需要”

指的是人的基本需要，相当于马斯洛意义上生理层次的需求，有限性是这一类型需要的重要特点。“欲望”则指的是超出基本需要以外的那些需要，它不是产生自人的自然的本性，而是来源于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类型需要的重要特点是无限性。比如说，粮食的基本功用是充饥，而人对充饥的需要是有限的，用粮食充饥或者用于充饥的粮食的性质都是自然的。粮食也可以用于超出充饥的用途，这些用途及用于这些用途的粮食就是非自然的。有限或无限成为界定和区分自然和非自然的标准。上天创造任一事物，所赋予的功用总是有限的，于是，有限地占有或者有限地按照其本来性质和功用来使用就是自然的，反之则是不自然的。

对获取物质财富的手段的伦理性质的判断也建立在这一标准之上。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色诺芬的“经济”概念，并将其视为一种有限地、自然地获取财富的手段。“经济”作为谋取财富的手段被分成两类，一是生产，二是交换。生产指的是实际的物质财富的生产，其目的是直接满足消费需要。由于需要是有限的，生产也就是有限的，因而是自然的。交换则被分成两类：一是物物交换，二是商品流通。物物交换的目的就在于消费需要，其目的是有限的，因而交换本身具有自然的性质。商品流通也就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如果其目的在于另外一种满足需要的商品，则这种交换本身也是自然的；如果交换的目的不是物质产品而是货币本身，由于对货币的追求是无限的，没有止境，则这种交换就具有非自然的性质。在《政治论》中，亚里士多德这样说：“货殖似乎是围绕着货币转，因为货币是这种交换的起点和终点。因此，货殖所追求的财富也是无限的。一种技术，只要它的目的不是充当手段，而是充当最终目的，它的要求就是无限的，因为它总想更加接近这个目的。”<sup>①</sup> 如果货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消费，那么对货币的需求就是有限的，而一旦货币本身成为目的，追求就变得无限。货币追求者总想接近目的，而目的又总在前面，于是追求永无止境。对货币的追求及货币的使用因此不再自然。实际上，在现代商品社会里，货币成为绝对的统治者，成为一切经济

<sup>①</sup>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转引自巫宝三主编：《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1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活动的目的，就进一步推动着社会经济运行偏离自然的轨道，不仅异化了个体，也异化了社会。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在其《货币哲学》中，深入探讨了现代背景下当货币取得对经济生活的绝对控制之后所导致的异化现象，这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货币使用的“自然”和“非自然”观念的深化和发展。货币最不自然的使用应该是借贷取息。在亚里士多德观念里，货币的自然功用一是方便交换，二是定价。在这一范围使用货币是自然的，而超出这一范围则是不自然的。“在致富的各种方法中，借贷确实是最不合乎自然的。”<sup>①</sup> 因为借贷取息严重超出了货币的自然功用，就像要求父亲生孩子或者要求公鸡下蛋一样。

经济思想或者伦理观念总是时代的产物，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又总是特定阶级利益的反映，如同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说的，“哲学家们的见解除了少数例外，都是吻合于自己阶级的金钱利益的。”“每一个阶级都曾有过丰富的理论论据在支持着经济上对自己有利的意见。”<sup>②</sup> 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哲学家或者是地主、贵族，或者被地主贵族所雇用，而地主、贵族往往是借贷活动中的债务人，商人则是借贷过程中的债权人。从债务人的角度而言，免除利息当然是有利的，于是亚里士多德才会提出反对利息的主张。亚里士多德的反对借贷取息的观念影响深远，一直到中世纪，教会反对借贷取息的教义，还需要利用亚里士多德的言论来加以论证。

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但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可能导致物质利益追求成为社会发展的某种破坏力量。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作为一种经济伦理，体现着对物质利益的一种克制态度，从而成为平衡物质供给与物质追求，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的力量。但是，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类需求及其满足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在现代商品经济的背景下还按照 2 000 多年前自然经济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的经济伦理来要求和规范人们的财富行为，则显得过时而荒谬。在这个意义上，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转引自巫宝三主编：《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150 页。

② 罗素：《西方哲学史》，243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